

当代中国青年网民的个人传统性及现代性研究 ——一项基于中国大陆四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¹

【摘要】个人现代性是现代制度扩张和启蒙思潮的后果。当代中国大陆的个人现代性受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工具理性、虚无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等六种思潮的影响。对青年网民的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测量表明，青年网民的个人传统性弱于成长于更早时期的网民；而青年网民的个人现代性和成长于更早时期的网民也有差别，但主要体现为青年群体在“自由平等”倾向上更为突出。两个群体在个人传统性和个人现代性上的对照关系反映了社会历史变迁的影响。

【关键词】个人现代性 个人传统性 青年 网民

【作者简介】赵联飞，男，1972—，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1 问题的缘起

1.1 关于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

个人现代性（individual modernity）和个人传统性的讨论源于现代化理论的讨论。关于个人现代性的研究最早出现在1950年代，当时正是现代化研究风行全球的时候。当时的学者认为，社会现代化（societal modernization）是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变化；而个人现代化则是社会个体在价值观念、工作习惯以及生活习惯方面的变化。个人现代性指的就是个人现代化的内涵。“所谓个人现代性（以下有时简称现代性），是指现代化社会中个人所最常具有的一套认知态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模式”（杨国枢等，1989：243）。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陆续有研究者以量表为手段进行现代性研究测试，探讨现代社会制度对人的影响。

在中文学术文献中，对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关注最多的是台湾学者杨国枢等人。自1960年代末开始，台湾学者开始探讨台湾的个人现代性问题，并开启了当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本土化研究。如杨国枢先生自己所说，这一探讨以1985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在西方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导引下进行的有关研究，而第二阶段则更加全面地研究分析了有关现代化理论，并提出对现代性的研究应该在四个方面进行改变：一是从“对立”到“分离”。即传统性和现代性可能不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而可能是各自独立的变量；二

¹ 本文是在本人博士论文《现代性与虚拟社区——虚拟社区交往和表达研究》的部分章节基础上修订而成。

是从单向度到多向度，即传统性和现代性可能不是单维变量，而可能是多维变量；三是从“单范畴”到“多范畴”；即现代性和传统性可能在不同生活范围中是不同的，应在不同生活范围内加以测量；四是“普同性”到“本土性”，即现代性和传统性研究的重心可能应是本土性的，而不是普适性的（杨国枢，2004：366-372）。

在大陆地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学直到1980年左右才逐步恢复。恢复重建后的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更多地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社会问题相关，较为理论化的问题以及有关西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系统梳理则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就个人现代性这一研究主题来说，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一书直到1995年才由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讨论在大陆并没有引起充分的讨论。

1.2 研究背景

笔者对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探讨源自于一项对互联网虚拟社区的研究。自从人类第一个计算机网络（APPANET）在1969年诞生以来，网络应用得到了飞速发展。截至2007年7月，中国网站数量超过131万个，网民数量达到1.62亿，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达到18.6小时，并且有73.8%的人在家上网。²³ 在上网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人们通过互联网保持和他人的交流和联系，这种现象一般被称为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或者在线社区（online community）。

表 1-1 中国网络应用使用率

	使用率（2007）	使用率（2011）
写博客/个人空间	19.1%	65.5%*
微博	—	40.2%
即时通信	69.8%	79.4%
电子邮件	55.4%	51.9%

资料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2007年7月、2011年7月

在虚拟社区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一般关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虚拟社区带来的各种转变和影响，这类研究主要探讨虚拟社区对人们的工作，生活，休闲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另一个问题则是对虚拟社区在线活动的描述和解释。由此也形成了关于虚拟社区研究的两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我称为“后果范式”，第二种我称为“悬置范式”。实际上，这个问题涉及的是技术应用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问题。

“后果范式”背后潜在的假设是技术发展能够带来社会生活的发展乃至变迁；并且，从

² 在CNNIC报告中，网民的统计口径为“6岁以上、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人数”。

³ 本文所讨论的时点在2008年中期，有关调查的数据收集于2008年年初；2011年最新的CNNIC数据表明，中国网站总数为183万个，网民总数达到4.85亿。

大量的此类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技术对社会的单向影响，而既有社会现实对技术应用可能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DiMaggio et al (2001) 曾经对这一问题提出过反思，不过他反思的重点在于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和其赖以发生的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互联网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社会要互联网变成什么样子”，对互联网的研究应该充分重视各种政策和组织的作用，互联网的未来以及它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都会受到人们对现有政策和制度安排的影响。虽然 DiMaggio 等人在此强调的是要从组织、制度、政策层面来对互联网应用发展的条件进行考察，但他道出了十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技术扩散对社会的作用并非一个单向过程，既定的社会现实会对互联网的应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DiMaggio 等人对互联网研究现状的反思对虚拟社区研究不无启示。不过，和 DiMaggio 等人不同，这里强调的是要充分考虑虚拟社区使用者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即讨论文化背景和虚拟社区的发展状况之间的关联。随着技术应用的推广，虚拟社区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但是，这种蔓延是否会受到当地既有文化传统的影响？一些虚拟社区研究已经开始涉及这个问题。比如说，Reid (1994)。然而，Reid 的研究只是在文化的总体层面和范畴的层面（如社会规则）上提出了虚拟社区活动的背景和虚拟社区活动的关联，还没有深入到具体的某一背景，因而其所谓的文化背景仍然是抽象的文化背景。从我们已知的其它技术应用情况看，这种影响是存在的。比如说，彩铃（CRBT）在中国 2006 年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 20%，在日本、韩国等其它亚洲国家的渗透率甚至达到了 50% 以上⁴。而同样的电信增值服务在欧洲的平均渗透率不到 3%。彩铃应用的差异化现象给我们一个启示：即技术应用确实会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进一步说，不同文化背景下技术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模式可能是互异的；如果虚拟社区的发展也存在类似上面所提到的差异化的彩铃应用现象，那么，文化背景和虚拟社区的发展之间就十分可能存在某种作用机制。确认这种作用机制的存在以及描述解释这种作用机制有助于人们理解虚拟社区为什么会是目前这种样子。

虚拟社区研究中的另外一个重要传统我称之为“悬置范式”。所谓“悬置范式”，是将研究焦点放在虚拟社区中各种在线活动本身的描述和分析上；并且，研究者对这些在线活动主体的背景不作考察。这种理解虽然明确了虚拟社区活动的主体是人，但因其关注点仅仅放在在线活动本身的考察和分析，不知不觉地忽略了在线活动群体中的人同时还是现实中的人，无形中就将虚拟社区和现实社区有意无意地隔离开来，其结果是研究者将虚拟社区视为和现实社会平行之物。虽然一些研究，比如郭茂灿 (2004)、刘柳 (2006)，也致力于用适用于现实社会的理论和逻辑来解释虚拟社区中的现象，但在这种理论“挪移”过程中却隐含地斩断了虚拟和现实的联系，从而无法在虚拟和现实的联系中来理解和阐释虚拟社区现象，最终成为一种“去背景化”的虚拟社区研究。虽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研究是一种“悬置”了背景的研究，但我认为不能把这种“悬置”了背景的虚拟社区研究作为对虚拟社区的全部认识。举例来说，如果忽略中国的社会时代背景，人们很难理解 2002 年的孙志刚事件、2003 年的

⁴ 参见 <http://column.chinabyte.com/ccclub/236/3387736.shtml>。

宝马撞人事件⁵以及 2004 年的山东临沂计生事件⁶；如果忽略美国长期以来的个人主义传统，人们也无法很好地理解 Gurak (1999) 中提到的美国人反对政府对电话加密技术进行掌控的案例；同样的，如果忽略个人现实社会身份的不同，我们也无法对他们在虚拟社区中的活动差异进行合理解释。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将虚拟社区现象作为整个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从而建立起虚拟社区现象和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其次，应该将虚拟社区现象的出现及其背后的意义置身于具体的历史时空来进行分析和研讨；最后，有必要将虚拟社区作为一种个人社会关系网络意义上的新型社区纳入社会交往这一分析主题，从而使虚拟社区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获得更多的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希望采取一种扎根理论的办法来建立其对网民虚拟社区互动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笔者首先对虚拟社区的概念进行了辨析，并选取了中国大陆 6 个典型的虚拟社区平台进行有关分析；接着又展开了 21 个深访和 8 个焦点小组；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可以用来帮助我们理解虚拟社区交往和表达活动的盛行。从而，对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研究是对整个虚拟社区研究中的一个部分。在这一部分研究中，笔者试图解决三个问题：

- (1) 梳理现代性问题的历史，明确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内涵；
- (2) 设计出能够用于测量中国大陆人群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工具；
- (3) 分析不同群体在个人传统性和个人现代性是否存在差异。

2 理解中国大陆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问题悠久而复杂。从词源学角度看，在公元 5 世纪，西方就开始使用现代（modern）一词（卡林内斯库，2002:55）。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的发展，现代性涉及越来越宽的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来自哲学、美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持久探讨。然而，关于什么是现代性这一问题，至今尚无统一答案，“许多作者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或对它们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界定。这些用法和界定，有时候不仅互不相同甚至还完全相反，常常令人困惑不已，不知所从”。（谢立中，2001）。由于本文将对个人传统性和个人现代性进行量表的修订和设计，这里先对现代性的有关研究进行一番回顾，从而为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的设计找到一个较为妥帖的理论依据。

⁵ 2003 年 10 月 16 日，黑龙江哈尔滨市苏秀文驾驶宝马车被一辆四轮车刮蹭，后苏秀文驾车将驾驶四轮车的农妇当场撞死，并撞伤 12 人。事后，当地法院给出了判刑两年、缓刑三年的判决意见，网民怀疑当事人苏秀文和黑龙江省某高官有亲属关联，由此引发网络评议并最终引起了中共中央高层关注。虽然宝马案并没有改判，但直接导致了中共中央 2004 年对黑龙江省干部任免的调查，一批官员因此落马。

⁶ 2003 年 9 月，山东临沂政府发出关于强硬执行计生政策的文件。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了强行流产等恶劣事件。2005 年 4 月，当地村民陈光诚夫妇开始出面维权；此后半年中，北京的部分律师先后参与维权行动。与此同时，国外媒体开始关注此事。2005 年 9 月，国家计生委官员正式承认临沂地区计生工作过程中存在暴力事件。

2.1 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研究简略回顾

在社会学中，对现代性的理解显得更加复杂多样。这种复杂性来自于多个方面：首先是因为社会学有许多分支学科，其次和不同学者的研究兴趣、接近问题的策略紧密相关，有时候还不得不归诸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我试图这些关于现代性的研究按照其着眼点的不同归为三个大类。

第一类是从制度角度入手的观点。这一类研究强调制度变迁在现代性分析中的中心地位作用，同时把现代性视为经历程度不同的变迁过程后的社会所具备的特征。下面这一段话很好体现了这一部分学者对现代性的理解图式。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过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过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周宪、许均，1999：“总序”）。

上面这段话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指出现代性概念的内在复杂性。但无意之间也暴露一个问题：对现代化的定义已经和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制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由此种路径出发理解的现代性是所谓“狭义”上的现代性，斯图加特·霍尔（Stuart Hall）也曾指出可以从四个维度对传统和现代进行区分，一是权力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二是有没有建立在货币基础上之上的经济以及受自由市场制约的大规模商品生产和消费；三是传统社会中存在的固定分层被动态的社会分层所取代；四是宗教世界观的衰亡，个人工具理性的流行（霍尔，2006：43）。很显然，持类似观点的学者更多地是将现代性与工业革命以来的那种典型社会变迁历程相关联，并往往进行“传统”和“现代”的比较。这种思想可以从经典的西方社会学思想家那里找到痕迹，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关于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区分，涂尔干（Emile Durkheim）关于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辨析，韦伯关于理性化过程的分析以及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关于模式变量的分析，都和这种观点有着内在的联系。回顾刘小枫关于现代现象结构的分析，可以认为，这种分析正是在“政治-经济”制度层面上对现代现象的透视，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宏大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层面上的制度变迁。而所谓现代性就是具备这样一些制度的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第二种观点关于现代性的社会学分析是从个体的态度和主观感受分析现代性问题，由于人的主观感受和价值观念以及意义相关联，很多时候也被归结到文化研究的领域中。美国社会学家伯曼（Marshall Berman）的这一段话明确地表明了这种对现代性的理解——“今天，全世界的男女们都在分享着一种重要的经验——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活中的种种可能与危险的体验。我将把这些体验总称为‘现代性’”（伯曼，2003：15）。虽然伯曼是在1980年代提出这个描述，但这种关于现代性的分析思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初，舍勒（Max

Scheler) 和齐美尔 (Georg Simmel) 就开创了研究个体心性结构的传统。舍勒深受现象学的影响, 提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结构来把握, 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 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 包括社会制度和精神气质, 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 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型的价值秩序的成形, 改变了生活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转引自刘小枫, 1998: 16)。至于齐美尔, 一般被认为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始作俑者 (Smith, 2001: 20-21)。在 19 世纪末, 齐美尔开始关注于城市生活和货币的研究, 在以《货币哲学》和《大都会和精神生活》为代表的作品中, 他详尽地探讨了货币、消费等现象的文化意义, 对都市人群的心理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在齐美尔看来, “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 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甚至当作一个内心世界)来体验 das Erleben] 和解释世界, 是固定内容在易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 一切实质性的东西被心灵过滤掉, 而心灵形式只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弗里斯比, 2003: 62)。弗里斯比指出, 齐美尔以及后来的克拉考尔 (Siegfried Kracauer)、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均是在波德莱尔所言现代性的意义上进行讨论, 其视角十分相似。“他们的现代性分析的共同点, 是经常无意识地接受现代性概念创始人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 所刻划的特征, 即‘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同上: 5)。在这种视角的关照下, 分析者往往从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出发, 分析其背后所蕴含的结构上的意义。如齐美尔认为, “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生命的总体性”(同上, 66), 克拉考尔提出, “一个时代在历史中占据的位置, 更多地是通过分析它的琐碎的表面现象而确定的, 而不是取决于该时代对自身的判断”(同上, 142)。同样, 本雅明拒斥认为所谓的整体景观, 坚持所有的现象都是万花筒中的碎片。在 1960 年代以后, 博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 关于消费的一系列研究也正是建立在这种“碎片化”分析传统之上。这种被称之为“碎片化”(Fragment) 的分析的策略, 按照伯曼的分析, 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从商品角度对资本主所做出的分析, 正是从那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伯曼, 2003: 22-23)。

在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中, 还存在另一种对现代性的理解, 那就是个人现代性 (individual modernity)。这种对现代性的理解实际上和齐美尔等人在 20 世纪初开创的传统颇有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 这种理解强调的是观念和行为模式; 相比之下, 齐美尔等人更多地强调观感和心态。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陆续有研究者以量表为手段进行现代性研究测试, 探讨现代社会制度对人的影响。英克尔斯等人在 1960 年代主持进行了著名的“经济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研究计划”, 这一计划的目的, 如英克尔斯自己所言, 就是“解释人们从传统人格转变为现代人格的过程”。英克尔斯指出, “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在人们身上发现的东西, 基本上反映了他们所在社会制度的性质……事实上, 大多数研究个人变迁的人认为, 个人变迁更多是由制度的现代性所引起的”(英克尔斯, 1995a: 5)。不过, 英克尔斯本人并不太同意完全按照帕森斯等人的分析理论去研究所谓传统和现代社会的关系。他更倾向于采取经济学家式的分析办法去发现一些共同的“因子”。在这个研究中, 英克尔斯通过对全球范围内六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人群进行量表测试, 探讨了制度环境对个人特征变迁

的影响，指出个人心理现代性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似性，并描述了可供经验辨识的现代人一般模型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乐于吸收新经验、减少对传统权威的依赖，相信科学和医学，守时、有计划、热心公共事务、对信息紧抓不放等（同上：118-119）。同时，他在研究中特别分析了教育、工厂等现代制度对个体现代性的影响，并运用分析模型、主体模型和行为量度这三种检验法方法进行了理论检验⁷。

就作者的观点来看，英克尔斯的研究中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它忽略了现代诸项制度带来的消极影响。在英克尔斯那里，现代化或者现代性无疑已经成为一个积极、进步的代名词。但如果我们从现代性作为人们的心态特征这一概念出发，异化、社会孤立、厌倦情绪等也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要现象，齐美尔在20世纪初有关货币和城市生活的分析是这方面研究的典型代表。另外，本文最初提到的杨国枢提出的四点批评十分中肯，也更加符合现实。特别重要的是，杨国枢等学者指出了本土性研究的必要。西方学者是在一种“古今”对比的结果中觉察到现代性的存在，因此他们看到的更多是现代制度的影响；由于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似性，文化的差异并没有彰显出来。但是当在一个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度中观察现代性问题时，文化背景的差异就变得突出，因而，不管是本土性的强调还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都显得十分必要。

从以上三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解来看，实际上第一种理解和第三种理解是基于共同的基础，即将现代性和现代制度的扩张紧紧联系在一起。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理解是从整个社会层面进行讨论和分析，而第三种理解则是从个体层面进行讨论。第三种理解所称的个人现代性恰恰就是第一种现代性（也即社会现代性）在个体层面的后果。第二种理解和第三种理解则在现代性作为一种个体心态特征上达成了共识，然而相比起来，第三种理解更强调现代制度的影响作用，而第二种理解受到波德莱尔传统影响，从而对于现代性和现代制度之间的联系没有给予更多关注。

为了更加清楚地展示现代性概念的理解途径，我试图将有关现代性的理解用图2所示的关系路径加以展示。

⁷ 值得指出的是，英克尔斯的这一研究有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196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持续增长时期，社会学也处于学科鼎盛时期，再加上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指标运动，这一切都有可能对这项研究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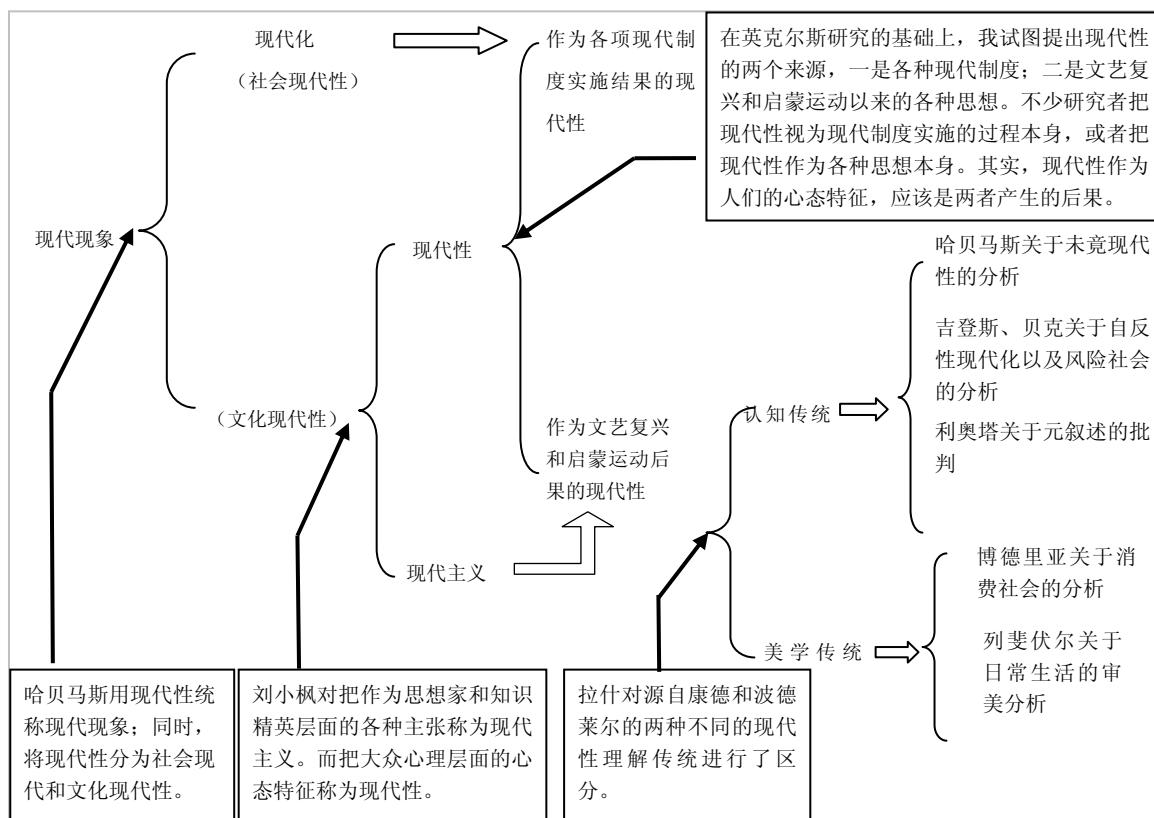


图 2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的图示

2.2 当代中国大陆的六种思潮

从思想观念的发展历程和现代制度的扩张影响两个方面入手观察当今中国社会,可以归纳出六种思潮,我分别称之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工具理性、民族主义、虚无主义和消费主义。这六个特征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和近代以来百年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践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们形成的观念、心态和行为模式的重要源头。

2.2.1 自由主义⁸

20世纪初,西方自由主义传入中国;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和改革开放则再次开启了自由主义的传播,其集中体现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从政治自由主义来说,新启

⁸ 按照《斯坦福哲学大百科全书》的定义,自由主义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一种政治传统;二是一种政治哲学;三是一种包含关于价值、个人以及政治哲学在内的一般性理论。同时在不同的国家,人们援用这一概念所指并不完全一致。不过总的来说,自由主义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即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以及经济自由主义。从政治角度讲,它主张个人为社会和法律的基础,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社会契约,公民在契约下制定法律并同意加以遵守;从文化来讲,它注重个人在道德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权利,包括如性自由、信仰自由、认知自由等议题,并保护个人免受政府侵犯其私人生活。而经济自由主义相对较为复杂,古典的经济自由主义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以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反对法律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此外,还存在着社会自由主义,也称改良自由主义(其英文为 new liberalism)和新经济主义(neoliberalism),前者受到功利主义影响,主张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以改善公共福利的提供状况,而后者则是在 1944 年《布雷顿森林协议》签订后,强调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消除国际贸易管制的一种思想。

蒙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集权主义提出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其最直接的后果是促进了“右派”的平反，此外，民主作风在各种组织中的得到了倡导和施行，一系列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和政策得以制定颁布，其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施行，这意味着在具有 2000 余年封建历史的中国社会中，“民告官”第一次有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其中所蕴含的政治自由主义意义不言而喻，而一度广为流行的政治自由主义还导致了 1987 年的自由化思潮和 1989 年的六四事件。文化自由主义的表现更为丰富，从喇叭裤、墨镜、长发、迪斯科音乐等时尚在青年人中的流行，一直到 1990 年代以来的婚前性行为、未婚同居现象的流行以同性恋的相对公开化都显示了文化自由主义的影响。就经济自由主义来说，其最根本的动力在于市场化进程。一方面，政企分开使得企业成为独立意义上的法人，同时各种非公有制企业的迅猛发展要求有自由的市场环境，在现实中，这种要求表现为对政府转变职能的呼声日益增高；另一方面，政府关于住房、医疗、教育等制度的一系列措施改变了以前“企业办社会”、“单位办社会”的状况，“铁饭碗”不复存在，对于大多数家庭和个体来讲，生存和发展都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市场体系中获得，个体的经济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和清晰，个体的权利逐渐得到了承认。

2.2.2 个人主义⁹

和自由主义一样，当代中国社会中个人主义的近距离思想影响在于 1980 年代的新启蒙思潮。这种思潮实际上是对 1949 年以来集体主义盛行的反动，也是对个人价值长期得不到肯定的质疑。这一思潮首先是表现为对一种非基于个体同意基础之上的公共化社会伦理观的反抗和颠覆。在 1988 年，深圳发生了著名的“蛇口风波”¹⁰。“真正使得这一诘难成为‘风波’的，并不在于蛇口青年提出的自利道德，更在于诘难行为本身对德育教授的社会法权身份的挑战：德育教授凭什么资格向青年提供应该必须信奉的人生伦理。”（刘小枫，1998：520）这一事件实际上透视出了个人主义在对个体价值观念的影响。

此外，新启蒙主义不仅对集体主义进行反对，同时还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本来，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也存在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基本上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费孝通，1998）。杨国枢进一步阐明了中国人心理的“社会取向”特

⁹ 个人主义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从根本上说，个人主义是个人在一种高度独立自我的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态度和行为取向。个人主义反抗权威以及所有试图控制个人的行动—尤其是那些由国家或“社会”施加的强迫力量上。这一点与政治自由主义有重合之处，不过，二者仍有区别。政治自由主义的对抗对象是国家权力的控制，其反抗的合法性诉诸于社会契约论；而个人主义则将矛头指向了所有的权威，包括国家权力，也包括任何正式或者非正式组织的权威，其反抗的合法性诉诸于天赋人权和自然法。路易·迪蒙（Louis Dumont）曾经引用法国大革命所形成《独立宣言》来阐明这一点，即“人生来便是自由的，并享有平等权利”，“一切政治团体的目的在于维护人的不受实效约束的自然权利，它们是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反抗压迫权”（迪蒙，2003：86）。与自由主义直接对立的是极权主义，而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是集体主义。

¹⁰ 1988 年 1 月 13 日晚上，共青团蛇口区委负主持“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三名青年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称为‘现实生活中的‘牧马人’”的某部调研员曲啸以及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与近 70 名蛇口青年座谈。座谈过程，一部分青年提出了个人价值问题，引起激烈讨论。参见 1988 年 8 月 6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的《“蛇口风波”答问录》。

性，所谓社会取向来自包括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四个维度（杨国枢，2002：79-103），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来把握自我认同和指导个人实践的个人主义，而新启蒙思潮所采用的武器是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个人主体性和理性；这样一来，一种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开始萌生。在此种意义上的个人，是天赋人权和自然法意义上的个人，其内核和中国传统个人主义并不一致。但不少年轻人接受了这一观念，这一点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¹¹。

在思想文化交融互动的同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变革也对传统个人主义产生了潜在的影响。这其中最重要的现实在于两点：一是工业化、城市化等社会制度的扩张；二是计划生育政策和家庭小型化。从前者来说，工业化等现代制度的变迁使得城市人群的组织方式迥异于农业社会，家族观念逐渐淡化¹²；而单位制在 80 年代以后的逐步弱化，使得相当多的人们改变了以前那种终生不变的就业轨迹，从而使得关系观念相对弱化；这二者的最终影响结果是使得那种固定地隶属于某一个组织或群体的观点逐渐弱化。对于后者，从 1980 年代初开始，中国开始严格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城市中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一孩政策使得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绝大部分城市孩子在没有兄弟姐妹的状况下成长；同时，80 年代以来，家庭小型化趋势有增无减，核心家庭、丁克家庭比例逐渐上升，这些都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个人主义的现实基础，为一种更加接近西方个人主义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2.3 工具理性¹³

在中国来，（工具）理性首先是在强调人的主体性意义上被引入的。早在 20 世纪初，五四运动就提出了欢迎“赛先生”的主张；而 1949 年后，马克思主义在一直作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真理对应论恰恰是作为其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内核而存在，这样，工具理性和主流意识形态在认识论的基础上达成了一致。由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倡导批判封建文化，从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角度讲，工具理性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在 1980 年代的新启蒙中，这种理性又一度作为反对家长制等文革遗风的武器。1978 年后思想上的“解咒”为工具理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 1978 年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了社会经济的主成分，个体经济活动成为国家严厉控制和打击的对象，同时主流意识形态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

¹¹ 最著名的包括电影《人生》、《远山》、《菊豆》等反映个人人生追求的一系列作品以及以反映改革人物个人价值的电视剧《新星》等。

¹² 中国南部地区的家族企业或许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例，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在沿海地区实行“三来一补”等经济发展规划有关。不少研究已经指出，家族企业已经面临着种种困境，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大多数家族企业仅是在资本的控制上家族化，但是对于生产管理过程已经无法用家族化方式进行管理。参见陈甬沪（2001）。

¹³ 工具理性源自于韦伯对行动类型的研究，往往也称“目标-手段”理性，其原意指对于可计算性以及效率的关注。韦伯认为，近代西方“解咒”之后转向俗世化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趋于按照工具理性的逻辑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并由此产生了两项最重要的后果，一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二是科层制在各类组织机构的实行。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对理性的理解一直遵循韦伯提出的这一角度，直到哈贝马斯在构建自己的沟通行动理论时才明确指出，韦伯的这一对理性的理解实际上在哲学上与源自笛卡尔的真理对应论紧密联系，这样一种理解强调主体的认知能力和经验层面对这种能力的验证，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科技理性和经济理性，从这种理性定义出发，最终导致了韦伯对资本主义未来的悲观态度。

集体主义精神，平均主义盛行。此种情况下，个体的经济理性不仅在现实层面被制约，同时在精神层面被阉割，而经济理性恰恰是工具理性发生作用的重要领域。这样，1978年以后重新发展市场经济的导向就无异于一场在经济观念上对中国大众的解咒，工具理性由此蔓延。此外，从作为一种崇尚科学、重视教育、追求效率的理性角度来看，工具理性的发展最终是随着各项现代制度的大规模扩散而得到传播的。工具理性实际上奠基于一种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改造的基本假设之上，因此，各种现代制度的实践活动就是工具理性的寓居之所。随着这一实践活动的扩张，工具理性得以潜移默化地发生了影响。

2.2.4 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源于拉丁语中的“nihil”，意为“什么都没有”。作为一种否定的虚无主态度，其流行是从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Ivan Turgeniev）在他的小说“父与子”（1862年）中描写的当时俄国兴起的“多余人”开始的（余虹，2006）。在西方历史上，虚无主义有着复杂的历史，在哲学、文学、伦理道德上，虚无主义有着不同的含义。哲学上的虚无主义包括认识论、宇宙论等等多个方面的虚无主义，其核心的思想在于对指对存在意义的否定，也即尼采所谓的“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除”。在尼采那里，虚无主义分为消极虚无主义和积极虚无主义。对于前者，尼采认为曾经作为西方价值之源的上帝和柏拉图以后的理性传统均代表着超感性世界，二者均设立了虚妄的世界，使人类的生命丧失了价值和意义。后者则是尼采所主张的生命哲学出发点，也即是在消极虚无主义的认识下，重返身体，张扬酒神精神，用生命来对抗和颠覆理性。海德格尔则比尼采走得更远，他所认为虚无主义是指对“存在（Sein）”的遗忘，“存在”本身应该是处于一种“无蔽”（Unverbergenheit）状态，乃是处于神秘地“发生”（Ereignis）之中。在海德格尔看来，不管是尼采还是西方历史上的超感性世界都是在将“存在”作为一切存在者存在的依据，尼采对于虚无主义的反对仍然在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内反对虚无主义，而他则主张反对一切形而上传统，回到存在本身。在伦理道德中，“虚无主义者”或“虚无主义”是用来指彻底拒绝一切既定的信仰、权威、道德和社会习惯，通常表现为极端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在文学和艺术中，有许多艺术运动如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都被人们认为有虚无主义嫌疑，而另一些艺术运动，如达达主义则公开将之奉为信条。

在中国思想历史上，虽然存在道家和佛家思想，但道家崇尚自然，佛家强调归于本心，这和西方历史上的虚无主义不可同日而语；而作为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则完全注重世俗生活。因而，虚无主义主要是一种西方传入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的传入与1980以后的中国现实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虚无主义首先在80年代呈现为知青文学中对文革的反思和对生命经历荒诞的描述，表现出一种怀疑一切的态度，典型的如诗人北岛的《我不相信》；而1992以后，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先前的所有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包括1980年代的短暂理性传统，都遭受到全方位的冲击，于是，价值的失落就在三重层面上同时发生了——中国传统思想、社会主义理想以及新启蒙理想。作家贾平凹的《废都》中的知识分子庄之蝶是这一思想状况的典型反映。而王朔所代表的“痞子文学”则更加全方位地展示了理想失落的

一代人在面对日益变化的社会时持有的虚无主义态度。在道德观念层面，传统道德观念和共产主义集体道德均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新的经济秩序尚未培育其与之相适应的稳定道德观念体系，因此呈现出主流道德观念缺位的局面。社会信任程度下降，社会冷漠以及一夜情的流行为这种道德虚无做出了最好的注解。

2.2.5 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consumerism）和消费文化紧密相连。按照费瑟斯通的观点，在消费文化研究中，有三种值得关注的理论：一是从资本主义消费生产扩张的角度出发去观察闲暇及消费活动的增长，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阿多诺（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¹⁴、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等人，其关注点在于消费是如何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的；第二种是将消费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地位的建构方式；也即是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及波德里亚有关论述意义上的消费；第三种则是关心消费本身带来的情感快乐和欲望等问题，这种观点强调大众文化中越轨、反抗和狂欢的传统，消费的意涵和狂欢节、节日盛会、烈性酒、淫乱的性关系紧密相连，从而成为大众对正统文化象征性颠覆以及表达情感宣泄的手段¹⁵（费瑟斯通，2000：13-22）。通常，人们认为，消费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或称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因而往往称之为消费社会。按照波德里亚等人的分析，在消费社会中，人们通过消费显示社会性的关系；同时，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边界模糊化，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中文中，消费主义这一字眼更多带有崇尚消费的意涵，因而人们更多地是在后两种含义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不过，从中国社会的现状看，上述关于消费文化三个层面的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就消费的生产来说，自中国1980年第一个电视广告播出到现在，广告已经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从报纸到电视，从广播到互联网，从居住区的电梯内到街上的公共汽车，广告四处可见并引导人们消费。而从第二层面上看，炫耀性消费从80年代即开始出现在中国，早在1996年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有富豪花30多万吃一顿饭的新闻，最近几年关于天价饭、天价手机的报道层出不穷，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中的富人区、别墅区从1990年代末就开始出现，消费已经成为一种身份构建的途径。至于第三种方式的最明显特征可以从一系列具有象征意味的现象出现得到说明：早年迪斯科舞厅的流行、近年的美女作家身体写作¹⁶和木子美¹⁷现象，都为这种消费主义提供了脚注。

值得指出的是，1980年代以来的虚无主义的滋生为消费主义的长驱直入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这一点看，消费主义在中国的盛行恰恰和西方消费主义出现的社会文化背景相似之处——尼采指出“上帝死了”，而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长期以来对启蒙的信心，此岸情结在超

¹⁴ 费瑟斯通此处指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辨证法》中对文化生产的讨论。

¹⁵ 这一点恰如贝尔所指出的那样，“他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needs），而是欲求（wants），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他因而是无限的要求”。

¹⁶ 主要包括卫慧、棉棉、九丹等，其作品包括《上海宝贝》、《糖》、《凤凰》等。

¹⁷ 木子美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女性网民，2003年在网络上公布了自己的性爱日记，引起舆论关注。

越启蒙神话的背景下空前高涨，同时出现了战后经济的快速恢复。而在中国，恰恰是新启蒙终结后，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消费主义得以蔓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当代中国社会的虚无主义可以看作为消费主义的润滑剂。

2.2.6 民族主义¹⁸

在中国，民族主义有着复杂的历史。在 1911 年以前，由于中国在两千余年内的疆土领域变化，在很多历史时期形成了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帝国形态，也发生过民族之间的战争，一度民族主义曾经等同于汉族的种族主义。而随着 1840 年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在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中逐渐形成了需要一个强有力民族国家政府的理念，由此，近代民族思想开始逐步萌生，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想的早期代表。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政权的建立以及国家的统一一直紧密关联，在 1949 年以后，民族主义也一直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动员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在社会层面，人们对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入侵始终存在着深刻的社会记忆。在 1949 年以后，民族主义思潮曾经多次以社会运动表现出来，典型如 1980 年代初抵制“日货”运动、1998 年“5.8”事件大游行。此外，民族主义在中国还体现在一系列寻求民族自尊的活动之中。1980 年代的“首漂长江”¹⁹，1990 年代申办奥运会，盛大的香港、澳门回归典礼，21 世纪初的神州系列飞船的发射，都是这些活动的典型代表，2005 年由网民自发组织的反日游行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潮背景下涌现出来的。

以上从分析的层面指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六种思潮，实际上，这六种思潮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有时候还不乏冲突。比如说，政治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很多时候结伴而行，而极端的政治自由主义又和虚主义不无联系；消费主义则和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紧密关联；民族主义和虚无主义在民族国家的价值问题上却是互相矛盾的。这样一种情况恰好说明了个人现代性应该从不同的领域去研究和认识。

3 数据和方法

3.1 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量表的修订

由于杨国枢等人在 1980 年代已经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针对中国人的多元个人现代性和

¹⁸ 民族主义就其字面的意义可以认为是在民族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关观念，它的形成源自于近代欧洲 15 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实际上具有包含了三重认同，种族、民族和国家。按照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说法，“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ethnic）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它人分割开”（盖尔纳，2002：2）。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看，民族主义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公民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等。

¹⁹ 1985 年，在得知美国探险家坎·沃伦即将带领人员漂流长江后，四川青年尧茂书自费漂流长江。1985 年 7 月 23 日，不幸遇难于金沙江。在此之后，一些人员在 1986 年成立了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并于 6 月中旬开始全程漂流。同年 9 月，他们抵达吴淞口，完成了漂流。

传统性量表，本文决定不再重起炉灶去自行设计有关量表，而是采取了一种修订的策略。具体来说，由于杨国枢等人发展的量表形成于 1980 年代，同时由于这些量表基于台湾的社会现状设定，有必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和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予以修订。同时，根据前文的讨论，大陆当代的个人现代性的某些内容在杨国枢等人的研究中并未涉及，如工具理性和虚无主义，对这部分内容需要进行新的量表设计。表 3-1 列出了本研究中所设计量表与杨国枢先生等人在 1980 年代所用量表的比对情况。

表 3-1 本研究所用个人现代性与个人传统型量表的对比

杨国枢（2004）		本项研究	
	内容	内容	项目个数
个人传统性	遵从权威	15	遵从权威
	孝亲敬祖	15	——
	安分守成	15	——
	宿命自保	15	——
	男性优越	15	男性优越
	——	——	关系取向
个人现代性	平权开放	10	自由平等
	独立自顾	12	独立自我
	尊重感情	12	对婚姻和性的开放态度
	乐观进取	12	——
	两性平等	12	——
	——	——	工具理性
	——	——	虚无倾向

和杨国枢等 1980 年代所使用的量表相比，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整体上说，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和严格心理学意义上的量表有所不同，更多地是一种变量测量手段，因此在题目的数量方面并未严格地一致。

二是在杨国枢等人的个人传统性的测量中，除了“遵从权威”和“男性优越”这两项外，还有“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等三项内容。但本研究中，除了“遵从权威”和“男性优越”这两项外，只有一项关系取向。这样的原因主要在于，在本研究设计中，个人现代性和传统型是作为自变量对待，因而研究者首先从理论上寻找和虚拟社区交往和表达相关的因素，这个时候，“孝亲敬祖”和“安分守成”的有关题目没有进入最初的量表测试过程中。并且，在本研究中的“关系取向”维度所包含的题目仅有部分和“宿命自保”量表中的题目相同，在既有题目上也增加了一些题目，从最终量表所包含的内容看，称其为“关系取向”更为恰当。

三是在杨国枢等人的个人现代性的测量中，“平权开放”和“两性平等”二者是独立的量表内容，但在本研究试调查的数据看，二者在因子分析中却是同属于一个维度，不能将其

分开，这说明在平等理念方面，大陆人群对平等的内涵并没有作进一步的区分；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标，这里仅保留了有关“平权开放”的有关项目，其所包含的项目也基本上由杨氏量表中的相应项目构成。“独立自顾”和“独立自我”的测量项目则是基本一致，对“婚姻和性的开放态度”的项目大部分来自于“尊重感情”量表，而“工具理性”和“虚无主义”则是由笔者另行设计的。

此外，个人现代性中并没有对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行测量，这同样是因为在虚拟社区交往和表达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不涉及这两个变量。²⁰

为了验证上述量表的有效性，笔者在开展正式调查之前对这些量表进行了试测²¹。试调查中个人现代性量表题目为 72 个，个人传统性题目为 41 个。经过因子分析并采取斜交旋转的方法，删除了个别鉴别力较低或因子负载较低的题目，最终确定了三个个人传统性量表和五个个人现代性量表。其中，个人传统性题目为 32 个，个人现代性题目为 50 个。8 个量表的信度检测情况如表 3-2 所示。

表 3-2 个人传统性和个人现代性的信度检测

量表	项目数	量表所包含的试调查项目题号	Cronbach α
独立自我	12	99、100、101、102、103、105、106、107、108、 109、112、141	0.745
自由平等	12	111、135、138、139、142、143、144、145、 146、147、148、155	0.861
对婚姻和性的开 放态度	12	116、117、118、119、120、121、122、123、 125、126、136、137	0.721
虚无主义	6	157、158、159、160、161、162	0.831
工具理性	8	115、156、163、166、167、168、169、171	0.766
遵从权威	12	173、174、176、177、178、179、180、181、 182、195、196、197	0.712
关系交往取向	8	184、185、187、188、190、191、193、194	0.634
男性优越	12	200、201、202、203、204、205、206、207、 209、210、211、212	0.940

各量表题目如下：

表 3-3 遵从权威量表项目

题号	内容
173	要避免犯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听长者的话。

²⁰ 但实际上，虚拟社区的表达包括了个人日常生活情感的表达和对社会事务态度的表达，后者在某些时候仍然和民族主义有关，但本人研究的虚拟社区表达没有包括这一类表达活动。

²¹ 限于经费和研究目的，试调查仅在北京进行，并且样本总数只有 102 个，其中男性 40 名，女性 62 名。

174	父母所敬爱的人，子女也应该敬爱
176	即使再有钱，买汽车的档次也不应该超过领导用车的档次。
177	开会讨论的时候，应该让领导和资历深的同事先讲。
178	强有力的领导比法律更重要。
179	为了整个家庭，家长的话大家都应该主动服从。
180	对于政府的法令，遵守就行了，没有必要管他合理不合理。
181	如果自己的意见和大多数人不一致，最好不要讲出来。
182	孤男寡女不可同住一室，以免引起人家误会。
195	只要是为了家庭的幸福，个人利益应该做出牺牲。
196	子女的成就应该归功于父母。
197	人遇到不公平的待遇，能忍尽量忍，以免惹出更大的麻烦。

表 3-4 关系取向量表项目

题号	内容
184	我只是关心我的亲人和为数不多的朋友，别的人我不关心。
185	家人或者亲戚犯了法，应该尽力加以掩护，以免受到惩罚。
187	当亲戚和外面的人发生矛盾，不管怎样都应该向着亲戚。
188	当了官没有发财，可以说是不懂得把握机会。
190	违反交通规则后，如果能够找人说情，不受处罚，那是最好不过的。
191	为了在公家机关办事方便，给经办人送点红包不算是什么贿赂。
193	明哲保身，少管闲事，是立身处世的重要原则。
194	和过于讲原则的政府官员交朋友没有什么用，他不会帮你什么忙。

表 3-5 男性优越量表项目

题号	内容
200	夫妻意见不同时，妻子应该服从丈夫。
201	女人应该避免在外抛头露面。
202	男人是一家之主，家中的事情应该由丈夫作主。
203	妻子的喜怒好恶，应该尽量迎合丈夫。
204	管教子女时，妻子应该以丈夫的看法与方法为主。
205	在性生活方面，男人应该比女人享有更多的自由。
206	妻子的喜怒好恶，应该尽量迎合丈夫。
207	女人的事业在家庭，已婚妇女不应该外出工作。
209	无论怎么说，女人还是不要参加政治的好。
210	新娘是不是处女很重要，丈夫对此计较是应当的。

211 女孩子不必要受太多教育，将来当好妻子和母亲就行了。

212 女儿长大以后总会出嫁，所以生女儿不如生男孩。

表 3-6 独立自我量表项目

题号	内容
99	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不用多与邻居打交道。
100	听到邻居夫妻吵架，只要事不关己，不必前去劝阻。
101	住在城市里认识的人较少，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 人情往来
102	家庭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必花太多时间与家人相处。
103	不求名，不求利的生活态度已经过时，不值得再去提倡。
105	与异性朋友交往是自己的事情，用不着告诉父母。
106	子女结了婚，最好不要与父母住在一起。
107	尽管父母健在，成年子女赚的钱也应该属于自己。
108	为了追求个人的目标，即使得罪别人也没有关系。
109	人一辈子不结婚也可以过得很好。
112	政府或者单位搞思想政治教育其实很可笑。
141	子女在婚姻问题上可以不听父母的意见。

表 3-7 自由平等量表项目

题号	内容
111	一个没有竞争的社会不是一个好社会。
135	电影中有关男女间性的情节，如果是剧情需要，则不应该加以剪除。
138	如果子女觉得自己的想法合理，即使父母反对，也应该据理力争。
139	子女信仰的宗教与父母不同，父母应该容许。
142	为了求学与就业，离开家乡去外地也没有什么关系。
143	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过起来也很有意义。
144	政府官员犯了错，人们应该可以公开批评。
145	政府改革者与宣传家，应可以在公众场合演说
146	政府或者单位都没有权力强迫个人做不情愿的事情。
147	如果老师有错，学生可以提出理由辩论
148	报纸和电视对腐败案件的曝光应该力度更大一些。
155	人一辈子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

表 3-8 对婚姻和性的开放态度量表项目

题号	内容
----	----

-
- 116 彼此相爱就可以结婚，不必计较对方是否曾经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
- 117 只要彼此相爱，婚前发生性关系也无所谓。
- 118 只要彼此相爱，女方年龄较大也可以结为夫妻。
- 119 与离过婚的人结婚，也没有什么不好。
- 120 与外国人结婚，并没有什么不好。
- 121 如果妻子的学历或者成就比丈夫高，丈夫也不必要感到羞愧。
- 122 女人大可不必因为被奸污而羞愧自杀。
- 123 只要彼此相爱就可以结婚，学历差距并不重要。
- 125 婚前同居有利于今后婚姻的稳定。
- 126 两个人一直同居但是不结婚也不错。
- 136 婚前同居是个人的选择，不应该受到限制。
- 137 如果婚姻生活太痛苦，则离婚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

表 3-9 工具理性量表项目

题号	内容
115	朋友聚会采取 AA 制平摊费用是最好的办法。
156	人活着要是没有理想，那就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163	社会的发展最终要靠科技来推动。
166	一件事情如果事先不做计划，就不可能成功。
167	人都应该在年轻时为自己规划职业生涯，这样才能获得事业成功。
168	和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应该尽量简短，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要讲。
169	上班的人不应该办公室打私人电话。
171	如果可能，应该把下一周或者更长时间内的事情都安排好。

表 3-10 虚无倾向量表项目

题号	内容
157	孝顺不孝顺，没什么关系。
158	政府其实没有什么作用。
159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爱情，男女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性的满足而已。
160	美丑善恶都只是教育人们的一些说法而已。
161	现在我们知道的历史都是人编写出来的，未必可信。
162	只要能挣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

3.2 数据收集情况

调查区域 本次调查的区域为北京、深圳、济宁、绵阳四城市城区。考虑到各个城市的人口分布情况、社会现状、调查实施成本以及本文的研究群体为城市人群，最终在北京市选取了城八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以及石景山），在深圳选取了关内四区（罗湖、福田、南山以及盐田），在济宁市选取了市中区，在绵阳市则选取了涪城区和游仙区。

调查对象 2007年1月1日以来一直居住在以上各市城区的18岁至60岁的非学生网民。此处网民的范围是过去半年内接触过互联网的使用者。因此，本调查的调查对象实际上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即：（1）至少在所调查的城市城区居住一年以上；（2）年龄在18岁至60岁之间，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一条件为在1948年1月1日和1990年1月1日之间出生；（3）非学生；（4）过去半年内接触过互联网。

调查时点 2008年1月1日—2008年1月31日

抽样方式 本抽样设计为两阶段不等群概率抽样。第一阶段以居委会（或地块）作为初级抽样单位，从每个城市的抽样框中抽取居委会（地块），并以这些地块内所含的住所地址总表作为下级抽样框；第二阶段以住所为最终抽样单位，从所有住所中按照等距抽样方法抽出计划数量的住所，并从住所中按照现场随机抽样原则选出一名网民作为最终受访用户。

样本容量及分配 由于目前没有非常细致的网民区域分布数量数据，同时有关统计指标中网民的统计口径和本文中的网民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²²，因此，对样本量的分配需要在有关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本研究假设，网民的地域分布大致上和人口的地域分布成比例，这形成确定样本量的第一个基础；此外，考虑到绵阳和济宁两城市的城市居住人口比例大大低于北京、深圳两市，如果严格按照城市人口比例分配样本量，势必导致这两个地级城市样本量偏小²³。因此适当增加了济宁、绵阳两市的样本数量。这样，济宁和绵阳的网民具有较北京、深圳两地网民为高的选中几率。

调查方式 本调查选取了访员入户方式。

根据上述原理，最终形成如下的抽样设计方案，各阶段的样本框情况详见表 3-11。

表 3-11 四城市最终抽样结果

		北京	深圳	济宁	绵阳
第一阶段	PSU	社区	社区	社区	地块
	样本框	社区列表	社区列表	社区列表	地块列表
	PSU 数量	1701	304	91	59
	样本量	20	16	15	15

²² CNNIC 数据仅仅统计到各个省；同时，CNNIC 的网民的统计口径为6岁以上，过去半年内接触过互联网的人群。

²³ 按照城市人口数量比计算，济宁和绵阳将分别只有50个左右的样本。

	抽样方法	等距抽样			
第二阶段	次级样本框	住所	住所	住所	住所
	总体数量	58588	40300	28422	11080
	样本量	420	315	165	180
	抽样方法	等距抽样			
第三阶段	现场抽样	运用 Kish 表，从住所中选取最终受访对象			

调查结果 调查结束后经数据清理，共获得有效样本 997 个。样本中，男性 493 名，女性 504 名；18—24 岁者 266 名，25—30 岁者 324 名，31—35 岁者 148 名，36—40 岁者 123 名，41—50 岁者 96 名，51—60 岁者 37 名；²⁴未婚 473 名，已婚（含再婚和丧偶）者 524 名。由于有 3 名被调查者年龄缺失，进入本项分析的样本为 994 个。

3.3 分析方法简介

本项研究所进行的调查对象是在 1948 年 1 月 1 日和 1990 年 1 月 1 日之间出生的非学生网民，其中的青年网民群体属于我们通常所言的 80 后青少年中的非学生部分。²⁵虽然既有研究设计是为了探究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与虚拟社区交往和表达之间的关系，但这里可以利用这一数据对 80 后网民群体与更为年长的网民人群之间的差别进行关于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差异的分析，具体将要用到的方法是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为了进行这样的分析，我们将调查时年龄 30 岁以下（含 30 岁）也即是 1978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划分为青年网民群体（以下简称青年群体），而将 1978 年 1 月 1 日以前出生的划分为年长网民群体（以下简称年长群体）。

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一般分为两类：一是检验各组的因子结构是否相同，二是检验各组的因子均值是否相同；第二类分析和传统的方差分析相似。就本研究来讲，我们我希望确定个人现代性和个人传统性量表的测量项目对于青年组和老年组是否同样有效；并且，在有效的基础上可以检测各项目在因子上的负荷是否等同以及因子得分是否相同。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首先分析模型的形态对于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来说是否相同，包括因子的数量和因子的从属样式（pattern）。简单来说，模型形态相同意味着对于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来说，个人传统性和个人现代性有同样的因子个数，并且每个因子所包含的测量项目也相同，因子负荷（LX）是否固定、因子方差（PH）和误差方差（TD）的元素是固定还是自由估计这样一些事项在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上是一致的。下面以个人传统型因子模型的分析为例来说明如何进行有关分析。

假设 $M_{T,Y}$ 是青年群体的个人传统性最佳拟合模型，而 $M_{T,O}$ 是年长群体的个人传统性的最佳拟合模型， $M_{T,T}$ 表示对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的共同拟合模型。显然， $M_{T,T}$ 的对两个

²⁴ 有三名调查者没有提供年龄。

²⁵ 一般来说，80 后指的是 1978 年以后出生的人群。

群体的拟合优度不会好于 $M_{T,Y}$ 和 $M_{T,O}$ 。但是，如果用 $M_{T,T}$ 的拟合两个群体和分别用 $M_{Y,T}$ 和 $M_{O,T}$ 去各自拟合的差别不是很大，那么我们则认为， $M_{T,T}$ 是有意义的。

如果 $M_{T,T}$ 能够较好地同时拟合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判断在两个群体之间，因子的负荷是否相等。也即是说，对于某个因子，比如说因子 1，是否青年群体的 LX11 年长群体对应的 LX11 相等。这一检验通利用模型卡方变化量 ($\Delta\chi^2$) 和自由度 (df) 的变化来进行判断。具体地说，设模型 $M_{T,T}$ 用于青年群体时有 $\chi^2_{T,Y}$ ，自由度为 $df_{T,Y}$ ，用于年长群体是有 $\chi^2_{T,O}$ ，自由度为 $df_{T,O}$ ，且有 $df_{T,O} = df_{T,Y}$ ；加上负荷相等条件后，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拟合模型的卡方值分别为分别为 $\chi^2_{T,Y(R)}$ 和 $\chi^2_{T,O(R)}$ ，自由度为 $df_{T,Y(R)}$ 和 $df_{T,O(R)}$ ，卡方的变化量为 $\chi^2_{T,Y(R)} + \chi^2_{T,O(R)} - \chi^2_{T,Y} - \chi^2_{T,O}$ ，自由度的变化则为 $df_{T,Y(R)} + df_{T,O(R)} - 2df_{T,Y}$ 。按照通行的模型比较思路，如果这一限定是有意义的，也即是说，可以认为对两个模型的各因子负荷是相同的，那么对于这一自由度增加所带来的卡方增量不应该太大（显著），这样模型才可以说是得到了优化；而如果卡方的增量过大，达到了显著程度，则认为作出这样的设定是不合理的，从而反过来支持二者负荷不等同的模型。²⁶

在验证两个模型的因子负荷是否等同后，面临两种可能，一是如果二者等同，则可以进一步验证二者的因子相关和误差是否等同，并考虑进一步进行因子均值结构分析；如果二者不等同，则可以对不等同的情况进行进一步分析，并找出导致不等同的原因。本项分析所使用的软件为 LISREL8.70。

4 分析结果

4.1 个人传统性

表 4-1 列出了对个人传统性的各种模型估计情况。其中， $M_{0,T,Y}$ 是对青年群体 ($N=590$) 进行的单独拟合， $M_{0,T,O}$ 是对年长群体 ($N=404$) 进行的单独拟合， $M_{1,T}$ 是用同一模型并且不加任何限制对两组同时进行拟合的情况，而 $M_{2,T}$ 则是用同一模型估计但是加上负荷等同这一限制条件的拟合。

表 4-1 个人传统性多组验证模型的拟合情况

编号	模型描述	df	卡方	RMSEA	NNFI	CFI
$M_{0,T,Y}$	青年群体单独估计	461	1643.71	0.069	0.92	0.92

²⁶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从经验上看，只要 $\Delta\chi^2 / \Delta df$ 小于 5，就可以认为两个嵌套模型之间等同（侯杰泰，2002：115）。这是一种更为宽松的标准。

M0 _{T, O}	年长群体单独估计	461	1363.95	0.073	0.91	0.92
M1 _T	两组同时估计但不设限制	922	3007.66	0.071	0.92	0.92
M2 _T	两组同时估计, 负荷等同	951	3057.45	0.070	0.92	0.92
M3 _T	负荷、因子相关和误差方差全相同	989	3133.35	0.069	0.92	0.92
M4 _T	均值结构模型(未限定等同)	1018	3228.85	0.070	0.92	0.92
M5 _T	均值结构模型(限定等同)	1021	3243.56	0.070	0.92	0.92

从表中可以看出, M0_{T, Y} 和 M0_{T, O} 的模型自由度均为 461, 自由度则分别为 1643.71 和 1363.95; 二者自由度之和恰好等于 M1_T 的自由度, 二者方差之和也刚好等于 M1_T 的自由度。从 RMSEA、NNFI 和 CFI 这三个指标看, 无论是单独的拟合, 还是同时的多组验证, 拟合结果均较为满意。这说明, 个人传统性量表的因子从属样式对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是基本上一样的。加入负荷等同的结果后发现, M2_T 的自由度较之模型 M1_T 增加了 29, 卡方则增加了 49.79, 也即是平均每增加一个自由度导致了 1.71 的卡方增幅; 由于对应的卡方临界值 $\chi^2_{(29,0.01)}$ 为 49.59, 从统计上看这一增量是统计显著的。不过, 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 卡方增量不是判断模型是否有意义的唯一标准。从本例的情况来看, M2_T 和 M1_T 相比, 各个拟合优度指标基本毫无差别, 其中 RESEA 甚至还低于 M1_T。因此, 在这里, 笔者认为应该接受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在个人现代性因子负荷上无差别的假设。

在认定因子负荷无差别的后, 我们继续进行检验。在 M3_T 中, 我们假设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的因子负荷、因子相关和误差方差均等同。结果卡方增加了 124.69, 自由度增加了 67, 平均每增加一个自由度导致了 1.86 的卡方增幅; 由于对应的卡方临界值 $\chi^2_{(67,0.01)}$ 为 96.83, 这一卡方增量水平超出了临界值; 但基于前面所述的考虑, 我们仍然接受 M3_T 和 M1_T 之间没有差别的假设。

M4_T 进行均值无差别的检验。我们假定青年群体的三个因子值为 0, 而年长群体的三个因子值分别为 0.127, 0.097 和 0.135, 其对应的 *t* 检验值分别为 3.536, 2.025 和 2.304, 均大于 2, 表明两个组别之间存在差异。

进一步地, 模型 M5_T 设定因子值等同后, 卡方较之 M4_T 增加了 14.71, 但自由度只增加了 3, 每一个自由度增加导致的卡方增幅超过了 4.9。因此, 我们拒绝认为 M5_T 和 M4_T 不存在差别的假设, 也即是说, 因子均值不等。

综合上述情况, 可以得出结论说, 个人传统型的测量对于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来说是同样有效的。从 M4_T 可以得知, 年长群体的个人传统性在三个维度上均强于青年群体。

4.2 个人现代性

表 4-2 列出了对个人现代性的各种模型估计情况。其中, M0_{M, Y} 是对青年群体 (N=590) 进行的单独拟合, M0_{M, O} 是对年长群体 (N=404) 进行的单独拟合, M1_{M, Y} 是用同一模型

并且不加任何限制对两组同时进行拟合的情况，而 M_{2M·Y} 则是用同一模型估计估计但是加上负荷等同这一限制条件的拟合。

表 4-2 个人现代性多组验证模型的拟合情况

编号	模型描述	df	卡方	RMSEA	NNFI	CFI
M _{0M·Y}	青年群体单独估计	1165	3604.44	0.063	0.88	0.89
M _{0M·O}	年长群体单独估计	1165	2933.20	0.065	0.90	0.91
M _{1M}	两组同时估计但不设限制	2330	6537.64	0.064	0.89	0.90
M _{2M}	两组同时估计，所有负荷等同	2375	7018.01	0.069	0.88	0.89
M _{3M}	仅“平等倾向”、“虚无倾向”负荷等同	2346	6564.42	0.064	0.89	0.90
M _{4M}	仅“平等倾向”、“虚无倾向”负荷等同、所有因子相关等同、误差方差等同	2411	6767.78	0.065	0.89	0.90
M _{5M}	仅“平等倾向”、“虚无倾向”负荷等同，所有因子的相关等同、误差方差等同、截距等同	2461	6962.89	0.065	0.89	0.89
M _{6M}	仅“平等倾向”、“虚无倾向”负荷等同，所有因子的误差方差等同、因子相关等同、截距等同，均值结构模型（未限定等同）	2456	6914.12	0.065	0.89	0.89
M _{7M}	平等倾向 虚无倾向负荷等同、所有因子相关等同、均值结构模型（限定等同）	2461	6940.30	0.065	0.89	0.89

从表中可以看出，M_{0M·Y} 和 M_{0M·O} 的模型自由度均为 1165，自由度则分别为 3604.44 和 2933.20；二者自由度之和恰好等于 M_{1M} 的自由度，二者的卡方之和也刚好等于 M_{1M} 的卡方度。从 RMSEA、NNFI 和 CFI 这三个指标看，无论是单独的拟合，还是同时的多组验证，拟合结果均基本满意。这说明，根据试调查得出的个人现代性量表结构是合理的。不过，加入负荷等同的结果后发现，M_{2M} 的自由度较之模型 M_{1M} 增加了 45，卡方则大幅度地增加了 480.60，由于自由度为 45 的卡方分布临界值为 $\chi^2_{(45,0.01)} = 60.96$ ，所以可以看到这一增量是极其显著的。由此表明，个人现代性量表的因子从属模式对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都适用，但总体上来说，因子负荷不等同。

为了确认到底是哪些因子的负荷在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之间不等同，我们分别对这五个因子单独进行分组验证比较，验证的方法和个人现代性整体测量模型的比较类似，比较结果表明，“自由平等”、“虚无主义”这两个因子的因子负荷在两个群体之间是等同的。而其余三个因子的因子负荷在两个群体之间不等同。有关验证的参数报告见表 4-3。

表 4-3 个人现代性各因子单独的分组检验比较

因子	模型描述	df	卡方	RMSEA	NNFI	CFI
独立自主	两组同时估计但不设限制	106	517.42	0.092	0.83	0.86
	两组同时估计，所有负荷等同	118	568.46	0.093	0.83	0.85

自由平等	两组同时估计但不设限制	106	358.64	0.071	0.95	0.96
	两组同时估计，所有负荷等同	118	376.49	0.068	0.96	0.96
对婚姻和性的开放态度	两组同时估计但不设限制	106	741.720	0.070	0.83	0.87
	两组同时估计，所有负荷等同	118	856.32	0.084	0.83	0.84
工具理性	两组同时估计但不设限制	38	178.339	0.091	0.90	0.93
	两组同时估计，所有负荷等同	46	362.73	0.116	0.81	0.84
虚无倾向	两组同时估计但不设限制	16	58.24	0.072	0.95	0.97
	两组同时估计，所有负荷等同	22	64.82	0.062	0.96	0.97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进一步观察 $M_{0M\cdot Y}$ 和 $M_{0M\cdot O}$ 的输出结果，发现其他三个因子在不少测量项目的负荷也十分接近，仅部分测量项目上的负荷有一定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试图采取一种部分测量相同（partial metric invariance）的模型进行因子均值比较。所谓部分测量相同是指仅限定部分元素等同的情况下，对模型因子结果进行的分析。²⁷有关因子均值比较的情况

M_{3M} 拟合了“平等倾向”、“虚无倾向”负荷同时等同的情况。结果是，相对于 M_{1M} 来说，模型自由度增加了 16，卡方增加了 26.78，卡方增长量小于对应的临界值 $\chi^2_{(16,0.01)} = 32$ 。因此我们接受 M_{3M} ，即可以认为“平等倾向”、“虚无倾向”的负荷均相同。

M_{4M} 拟合仅“平等倾向”、“虚无倾向”负荷等同、但所有因子相关和误差方差等同的情况； M_{5M} 在 M_{4M} 基础上进一步限制截距等同， M_{6M} 则是上要求了因子均值自由估计。 M_{7M} 则进一步检验了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因子均值等同的假设。

从拟合的情况看，相对于 M_{3M} 来说，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 RESEA、NNFI、CFI 均没有太大变化，但卡方的增长较快。如果我们不将卡方作为验证模型的唯一标准，则可以认为这几个模型都可以接受。不过，在 M_{7M} 中，模型设定了青年组的各因子均值为零，对年长组进行了估计结果发现，“独立自主”、“自由平等”、“对婚姻和性的开放态度”、“工具理性”、以及“虚无倾向”等五个因子的均值分别为 0.084, -0.115, 0.038, 0.029, 0.015，其对应的 t 检验值分别为 1.407, -2.794, 0.870, 0.761 和 0.256。这一结果表明，青年群体在“自由平等”方面比年长群体更强的倾向；而在其他四个方面，二者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差别。

5 结论

通过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我们发现，在个人传统性的方面，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在个人现代性的因子从属模式也是一致的，但各个成分的作用大小存在轻微不一致的情况。青年群体在“遵从权威”、“关系取向”、“男性优越”方面的因子得分均低于年长群体，其差异具有统计上的

²⁷ 按照 Vandenberg 和 Lance (2000) 的建议，这种比较应该在部分题目负荷不等的情况下进行，并且应该有较强的理论依据。本研究的情况正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

显著性，这说明青年的个人传统性相对较弱。而在个人现代性方面，研究发现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在个人现代性的因子从属模式也是一致的，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在“自由平等”、“虚无主义”方面的因子负荷等同，但在“独立自我”、“对婚姻和性的开放态度”以及“工具理性”方面的因子负荷不等同。采用部分测量相同的方法对个人现代性因子均值进行检验表明，青年群体在“自由平等”方面的倾向更强，而在其他四个方面与年长群体没有差别。

上述多组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是意味深长的。回到本文在现代性生成回顾的讨论，可以说，这样一种结果恰好展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影响。1949 年以来，大陆传统文化实际上受到了正统意识形态和现代西方思想的双重冲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传统文化的式微，这也是青年群体在个人传统性方面弱于年长群体的重要原因。而就个人现代性来说，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几乎同时面对并经历了 1978 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本研究中的调查对象年龄最大为 60 岁（2008 年 1 月时），也即是说，在 1978 年时，这批人年龄最大才 30 岁，恰恰是在他们生命的壮年时期和改革开放来了一次彻底拥抱。而 1978 年以后发生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事件，包括经济上的市场化，单位体制改革，住房、医疗、教育的改革，历次通货膨胀，新启蒙运动，对这一批人也是有着直接的影响，而青年人也正好同样地成长于这一环境之中。从可感知的社会现实来说，个人主义蔓延、社会道德滑坡、拜金主义盛行、政治信任式微、家庭责任感的弱化乃至两性情感的变质等种种现象都在这一阶段出现，青年群体和年长群体一样都未能逃脱这一大潮的席卷，二者在个人现代性因子均值上的总体相同恰恰是反映了这样一种趋势。而作为青年人在“自由平等”方面得分更高则可以归因于青年群体的总体社会地位较低，从而更容易具有追求自由和平等的倾向。

上述对个人现代性的这一番考察还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即正如 *modern* 一词在西文中最先意味着“新的”一样，个人现代性是意味着当代社会（目前来说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的心态特征，这样一种心态特征是社会进程留在个体身上的痕迹。即使我们同意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指社会生活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在分析个人现代性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在这一过程中注意本土社会变迁的特质，并在将现代性作为分析“古”“今”差异的分析过程中审慎地把握本土社会文化因素所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美] 阿历克斯·英克尔斯著, 何欣译, 《迈向现代化》, 1995a, 台北,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 [2] [美] 阿历克斯·英克尔斯著, 曹中德等译, 《人的现代化素质探索》, 1995b,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3]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著, 顾爱彬, 李瑞华译,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 2002,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4] [美] 马歇尔·伯曼, 徐大建, 张辑译,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 2003,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5]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 田禾译, 《现代性的后果》, 2000,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6] [英] 安东尼·吉登斯著, 赵旭东, 方文译,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 1998, 北京, 三联书店
- [7] [英] 戴维·弗里斯比著, 卢晖临, 周怡, 李林艳译, 《现代性的碎片》, 2003,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8] [英] 斯图加特·霍尔著, “现代性的多重建构”, 载于《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 2006,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9] 陈嘉明, “现代性的虚无主义”, 2006,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3 期, 119-125 页
- [10] 陈劲松, “现实社会中的虚拟社区的权威表达”, 《社会科学研究》2001 年第 4 期, 第 113-116 页
- [11] 费孝通, 《乡土中国》, 1998,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2] 候杰泰等,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 2002,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13] 黄发友, 2006, “虚无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学”, 《文艺与争鸣》, 2006 年第 4 期, 90-98 页
- [14] 黄方铭(台湾)著, 《结构方程模型模式: 理论与应用》, 北京, 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5
- [15] 刘柳, “虚拟社区中的人际互动”,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年第 2 期, 36-40 页
- [16] 刘小枫选编, 1999, 《舍勒选集》,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17] 汪晖著,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2004, 北京, 三联书店
- [18] 吴冠军著, 《多元的现代性》, 2002,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19] 谢立中, “‘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5 期, 第 25-31 页
- [20] 杨国枢著, 《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 本土化研究》, 2004,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1] 余虹, “虚无主义——我们命运的深渊?”, 《学术月刊》, 2006 年第 7 期, 14-22 页
- [22] 周宪、许均主编, 《现代性研究译丛》, 1999,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3] 周宪主编, 《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 2006,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4] 周宪著, 《审美现代性批判》, 2005a,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5] 周宪主编, 《文化现代性与审美精神》, 2005b,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6] DiMaggio, P., et al, “So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nterne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7, (2001): 307-336.
- [27] Gurak, L. J., “The Promise and the Peril of Social action in Cyberspace: Ethos, Delivery, and the Protests

- over MarketPlace and the Clipper Chip”, In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Smith M. A., & Kollock, P., Ed. London, Routledge, 1999, 243-263.
- [28] Reid, E., “Hierarchy and Power: Social Control in Cyberspace”, in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Smith M. A., & Kollock, P., Ed. London, Routledge, 1999, 134-163.
- [29] Vandenberg, R. J. and Lance, C. E. “A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the Measurement Invariance Literature: Suggestion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2000 3: 4
- [30] Cunningham, W. R., Ability factor structure differences in adulthood and old age. Multivariate, Behavioral Research, 1981, 16, 3-22.